

顾明笛听出张薇祎在赌气



《三城记》
张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月的一个周日，北风有点潮湿，午后阳光温暖。顾明笛从小区的北门出来，沿着长宁路信步往西走。关于“九姓渔户”，关于梅城，关于百越族，历史材料已经烂熟于心。最近，他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如箭在弦，一触即发。他很想找个人分享这些想法。应该跟张薇祎聊一聊，很久不见她了，顾明笛这样想着，已经不知不觉地到了凯旋路口。他听从自己脚的命令，不由自主地转弯向北行。他的脚很熟悉这条路。前两年，每个周四晚上，他都要从这条路走过苏州河上的铁桥，去研究生课程班上课。他喜欢从凯旋路桥北面那个楼梯下去，走到离水面距离最短的近水楼台。河岸被铸铁栏杆拦住，栏杆上有铁皮拧成的幼稚的蝴蝶状花纹，靠着栏杆，伸手几乎可以碰到河水。河面很窄，对面的右边是东山公园的后门，左边是政法大学校园，可以听到学校特有的喧闹声。一位戴红袖章的老头儿，穿过葡萄架往河岸走来，冲顾明笛警惕地问：“依做啥？”

这种在街上发挥余热的退休老人，上海很多，看上去凶巴巴的，铁面无私的样子，其实挺热心的，而且胆小心软。比如你在路上丢了纸片，他说“罚五元”，说着便要撕五元的发票。你大声喊叫说：“不！”他马上就改口说：“那就罚十元！”说着就要撕十元的发票。你往地上一蹲，大哭起来，当然是假装，他就会吓得赶紧来哄你：“好了好了，勿要哭，起来，不罚了，依快点走吧，以后勿要这个样子啊！”有一次，顾明笛和一位女同学，在学校的花圃里偷了一朵月季，被远处精明的袖章老人发现了。袖章老人大喊：“站住，勿要动，罚款来了！”一边喊着往这边奔来，一边手撕发票。顾明笛和女同学急中生智，抱在一起亲吻，半天后才抬起头来，一看，袖章老人影儿都没有了。

此刻，在铁桥下面的苏州河边，袖章老人也很严肃，目光警惕，步步逼近，一副猎人要猎物下手的样子。顾明笛缓缓地说：“没做啥。”听到上海话，袖章老人打算离开，但又有一点不甘心的，关切地问：“依没事吧？”顾明笛说：“没事。”袖章老人沮丧地拐到别处去了。顾明笛会心地笑了笑，接着给张薇祎发短信，等了一阵不见回音，便拨通了她的手机。

顾明笛说：“你在家吗？在干吗呢？”
张薇祎说：“在啊。你怎么想起我来了？”
顾明笛说：“经常想到你啊。想跟你聊聊。”
张薇祎说：“你怎么有时间聊天了？聊吧，我听着呢。”

顾明笛说：“嗯，事情还挺复杂的，当面聊怎么样？”

张薇祎说：“什么复杂的事情非得当面聊？不又是谈小说吧？”

顾明笛说：“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谈小说？”

张薇祎说：“你除了小说还会谈别的吗？”

顾明笛听出张薇祎在赌气，大概又是埋怨自

己太久没有露面。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倒是张薇祎心软了，她知道顾明笛就是这个样子，做什么都一根筋。也不能怪他。她还是挺高兴能和顾明笛见面，谈什么话题都无所谓。张薇祎说：“好吧，你过来，我今天不想出门。”

他们两人交往的风格很特别，没有小资产阶级的那种温情脉脉，更没有巴洛克式的奢侈和洛可可式的夸张，而是直截了当的简约之美。张薇祎多次试图回到巴洛克之前的古典风格，都没有成功。这既有她自身的心理障碍，也与顾明笛的坚持有关。然而最近，张薇祎似乎有点把握不住了，决定要回到18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这是顾明笛最不能接受的风格。哪怕是回到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也好啊。

顾明笛迅速顺着北河沿路走到了内环路，上了一辆往北行驶的公共汽车，在金沙江路口换了车，往西跑了大概十几站地，到祁连山南路口下车。然后按照张薇祎的指示，再往北走了约一公里，就到了张薇祎家的小区，金沙江新村，一个旧式社会主义小区。进门便是兼做餐厅和客厅的小间，里面有两间屋子，大的主卧室是父母的，他们跟旅游团“欧洲五国十日游”去了。张薇祎的小房间有点拥挤，但收拾得有条不紊，尽管没有明显的小女生气，小资气息还是十足。墙上挂着一幅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复制品，是将神圣的生活融化在世俗生活场景中的代表作。窗台上的花瓶里插着几枝郁金香。书架上、床上、地板上，摆满了各种书，一套《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摆在床边的小书架上。

张薇祎刚入职不久，这段时间忙于各种杂事，顾明笛是知道的。她有些疲惫的样子，眼神慵懒，粗看上去，倒是平添了几分娇柔和妩媚。张薇祎敏锐地发现，就在进门的那一刻，顾明笛的眼神里掠过一丝轻微的、飘忽的柔情，但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当张薇祎要捕捉住那种情感时，它却像蚊子似的身子一晃，转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了。尽管如此，张薇祎还是忍不住心头一热，眼圈都红了。

张薇祎转过身去，调整了一下情绪说：“你的‘九姓渔户’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这么远赶过来谈文学，是不是有点奢侈？”

顾明笛隐约感到一股咄咄逼人的气息扑面而来。刚进门时差一点冒出来的隐秘的柔情，顿时烟消云散。他说：“不会吧，只要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值得，无所谓奢侈不奢侈。我正想跟你聊一聊研究成果怎么转化为文学作品的事。”

张薇祎心想，他竟然说“喜欢”，他到底“喜欢”什么呢？张薇祎说：“你到底是喜欢谈文学本身，还是喜欢跟我谈文学？或者像你自已所说的，只有在谈文学的时候，你的自我感觉才是最好的？”张薇祎将重音放在“跟我谈文学”的“我”字上面。

顾明笛本来想把对新的小说人物形象钱杏儿的构思讲给张薇祎听。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张薇祎的三个问号堵住了嘴巴，好像大脑也短路了，以至于他无法按照自己原来的设想跟张薇祎聊天。顾明笛认为，张薇祎那些问题刁钻古怪，有点任性，因而显得小女人气，不值得正面回答，他试图把话题绕回原来的轨道上去：“我要塑造的是东方吉卜赛女郎钱杏儿，一个伟大的中国女人形象……”

张薇祎心想，他又要塑造一个歌伎！小说《象奴》里面的许和子，就是一个歌伎，长安的歌伎。《梦中的动物》里面那些奇形怪状的鸟兽，比如绸、鸬鹚，它们最擅长的就是用声音诱惑男子，行为也是歌伎。现在又来一个钱杏儿，还是歌伎，南方长江上的歌伎。他的歌伎想象配置齐全，官方的、民间的、人类的、鸟兽的，他把所有人都想象成歌伎。这正是他顾明笛和所有古人的一种潜意识，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文学化表达。现代男人和古代士大夫之间的差别，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张薇祎看着顾明笛还在语言表演，心里涌出一丝不快。她沉默不语，逼使顾明笛不得不暂停下来。顾明笛心想，看来必须面对张薇祎的提问，但又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那三个问题。我仅仅是喜欢谈文学吗？还是只喜欢跟张薇祎谈文学呢？或者说我喜欢的是在谈文学的时候那种自我感觉？这里毫无疑问充满陷阱，对于一个大脑过度缜密的人而言，怎么回答都会漏洞百出。如果说，男女之间只有谈文学才能交往，那么，其他更多不谈文学的人就不要交往了？或者说，你只喜欢文学，跟谁谈文学都无所谓，那么你总是找张薇祎谈干什么？同样的道理，只有谈文学的时候才自我感觉良好，难道文学就是你自我展示的工具吗？一个人自我展示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什么只用文学的方式呢？

一份寒门的名单



内容简介

阿德里安·纳塞利是一名典型的“阶层跨越者”：他的父亲是公交车司机，母亲是秘书，但他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该学院曾培养出罗曼·罗兰、萨特、波伏娃、福柯、阿隆等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纳塞利去寻找那些出身贫寒的学者、法官、记者、作家等等。他想见的其实是这些人的父母。

内容简介

一部书写“80后”成长史的长篇小说，聚焦主人公顾明笛的命运变迁。同时直面当下中国城市生活，以此为原点辐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和精神状况。新兴时代，小资青年，有多少人在“逃离北上广”，就有多少人在这里寻找归途。沙龙、报社、高校、互联网，立足的城市与遥望的乡村，哪里才是顾明笛们的出路？

作者

张柠

作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等。著有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文学与快乐》《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感伤时代的文学》《白垩纪文学备忘录》《枯萎的语言之花》《叙事的智慧》《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合著)等。

2009年9月，我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入学后我就开始着手搜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和我不一样，都是家里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不是工程师，不是记者，不是教授，不是外科医生，不是公司高层，不是外交官，不是建筑师，不是电影制作人，不是银行家也不是中世纪文学家；所以按常理来讲，我们这类人本不应该出现在法国的大学校园里。搜集这份名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仔细寻找才能有所收获。在发现这些同类的时候，我居然有了一种恋爱的感觉。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我还设计了一套搭讪的策略，以向他们表明我和他们是同一类人，为了不失去联系，我会立刻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我的小本子上或者手机上，这样做是有点儿荒唐，但我还没有荒唐到把他们的身份信息做成一个电子表格——如果我早这么做就好了！说不定还能让调查更方便些。

您将要读到的故事是这些孩子的故事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因为这也是他们父母的故事。这些孩子出身于小中产阶级、平民阶级，甚至穷困潦倒的家庭，他们跨越了阶层，打破了法国学术界著名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建立了另一套成功者的形象，几乎摆脱了自拉斯蒂涅——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一名力求跻身上流社会的角色——以来就被烙上的野心家标签。他们受到了媒体、大学甚至政界的追捧。还有什么比成功更令人兴奋和感到欣慰的呢？特别是这种“逆袭式”的成功。

阶层跨越者们已经(或几乎)成了超级明星，对于推崇绩优体制(méritocratie)的社会来说，他们的存在至关重要，他们象征着一种可以摆脱当下、自由选择生活的希望，他们是童话故事的主角，是法国的图腾。但绩优体制早已被社会学家解构，其意识形态与真实的社会是无法调和的：法国的社会阶层并不会发生改变。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规律，是一个事实。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贫困家庭的后代们需要历经6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法国的社会平均收入，即需要180年。对于阶层跨越者们来说，一切仅仅发生在这一代人中。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将法国列为经合组织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即社会阶级对个人受教育程度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然而，统治阶级仍不断宣扬教育能让孩子们在竞争中拥有公平的机会。

近年来，阶层跨越者们不再满足于在电视节目里微笑着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向观众致谢。社会学家罗斯·玛丽·拉格拉沃(Rose-Marie Lagrave)和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爱德华·路易(Édouard Louis)和尼古拉斯·马修(Nicolas Mathieu)，哲学家尚塔尔·雅盖(Chantal Jaquet)和社会活动家阿卜杜里赫·拉鲁伊(Abdelilah Lalous)都拒绝充当人摆布的棋子，他们纷纷站出来揭露绩优体制的真相。近距离见证了绩优体制对人的分类、排斥和挑选，一些阶层跨越者发现他们远没有预见社会地位上升带来的后果。除了为完成学业而投入的金钱外，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身份认同上，完成阶级跨越这项壮举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千辛万苦得到文凭后将面临什么？后半生将归属于哪个群体？绩优体制最终会显露出其真实的面目，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注好了价格，要使咒语起作用就必须付出代价。往后余生，他们将以两种身份生活，对两个世界爱恨交替，并祈祷有那么一天，穿梭于两个世界的内心可以得平静。